

# 现代 东方 哲学

XIANDAI DONGFANG ZHEXUE

黄心川 主编  
王守华 朱明忠 副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B305  
H900

黄心川 主编  
王守华 朱明忠 副主编

# 现代东方哲学

浙江人民出版社

037868

责任编辑 李 宁  
封面设计 孙 璐  
责任校对 鞠 朗

---

## 现 代 东 方 哲 学

主编 黄心川 / 副主编 王守华 朱明忠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印 刷 杭州云轩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杭州云轩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9.75 插 页 4  
字 数 456 千  
印 数 1—3600

---

版 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

---

ISBN 7-213-01628-8/B·45

---

定 价 36.00 元

## 绪 论

### 第一节 东方与东方哲学的范围

东方是一个地理概念，它相对于西方而言。从世界地理的分布上看，东方应包括整个亚洲和非洲中部、北部地区。然而，这一地理概念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以往人们对地理知识的缺乏，常常被混淆了。在古代，我国古籍中以中国为中心，把地处中国西北的印度看做西方，佛教徒称印度为“西方佛国”，把地处东邻的日本称作“东瀛”。另外，把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划分为“西洋”和“东洋”，这种分法当然是很不科学的。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东方以后，又把中国、日本、朝鲜、印度乃至整个阿拉伯国家包括非洲在内，都通称为东方，以此区别于他们的西方世界。由于东方地区的国家和人民长期受到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奴役和掠夺，他们的文化也遭到西方“欧洲文化中心论”者的摧残和破坏。因此东方这个概念又被赋予了政治和文化的意义，这些涵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革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家的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例如孙中

山在1924年所作的《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中，曾把东方文化说成是主张仁义道德的王道文化，把西方的功利强权说成是霸道文化。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东方概念首先应是地理概念，但在某种场合下，也具有政治和文化的涵义。

东方哲学指的是中国、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各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拉伯、巴勒斯坦等国或地区的哲学。世界上有四种具有地区特征并自成系统的哲学体系，即中国、印度、希腊和阿拉伯哲学，其中中国、印度、阿拉伯哲学都位于东方。东方的某些地区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孕育了世界最早的文化，也产生了人类最早的哲学思想。东方哲学是东方文化的思想基础，是东方人民的世界观、社会伦理观和思维方式，在东方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东方哲学不仅在东方各国之间，而且也在东西方之间进行长期的交流，对世界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印度、波斯、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等等传入我国后，与我国传统思想相结合，开出了绚丽多姿的哲学花朵。因而，中国哲学是东方哲学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中国哲学包含的内容多，覆盖面广，时间长，在这部篇幅不大的简明著作中要详加阐述有一定的难度，而且中国读者对自己民族哲学一般比较熟悉，有大量的、专门的著作可供阅读，因此本书只好割爱。但是由于中国哲学（特别是儒、佛哲学）与我国周边国家的哲学有着长期的双向交流，彼此互为影响，因此，凡涉及到这方面的关系时，本书仍给予一定的篇幅。当然，这些篇幅只能是蜻蜓点水般地阐述，很不深入，我们希望将来能有中国与周边国家哲学交流的专著问世。

本书主要阐述现代东方各国哲学的发展状况。由于东方各国对近、现代历史分期不尽一致，因此，大致确定在第二次世

世界大战以后。东方哲学从总体上看是一种保持型的哲学体系，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有些思想体系一经形成以后，自古迄今一直在发生正面或负面的效应。中国的儒学思想迄今已有 2500 年的历史，中间虽然经历了不同阶段，出现过不同的形式，但今天还在发生影响。印度的吠檀多哲学也有 3000 年左右的历史，但目前仍以这种或那种形态在印度和世界出现。伊斯兰教和佛教依然是当前世界最有活力的宗教思想体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东方哲学的起源、发展、变化、转型的过程作一简略的回顾，使读者对现代东方哲学有较系统的和深入的了解。

## 第二节 东方哲学史概观

东方哲学思想自公元前 4000—公元前 3000 年在古代埃及出现以后，迄今已有 5000 余年的历史。它经历了发生、成长、荣枯、新生等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四个时期。

### 一、古代哲学

世界文明是从东方开始的。公元前 4000 年—公元前 2000 年初，中国的黄河，南亚的印度河、恒河，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开始跨入阶级社会，随后在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和伊朗高原相继产生了一批奴隶制国家。这些地区和国家孕育了世界最早的文明，同时也产生了最早的哲学思想。在埃及，从流传下来的宗教经文——《金字塔文》、《死人之书》和《生命之书》中可以看出，原始居民已

在探讨世界本原的问题。有的祭司神学家宣称，宇宙是一些自然力（神）产生了另一些自然力的一系列产物，太阳神瑞是这个宇宙的主宰；有的怀疑论者则认为自然界的水、火、空气是世界的根源。此外，从大量的《箴言》中可以看出，古人树立了很多道德、伦理准则，如不害人、正道、宽恕、乐观等。古代两河流域也是哲学思想的故乡，在著名的《创造之歌》中，巴比伦的最初哲学家用神话的方式探讨了宇宙形成的原因、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他们描绘说，太初从水渊中出现了男女之神并出现了“众神之主”马尔都克，他创造日月星辰以及血肉的人类，从而完成了宇宙的创造过程。印度哲学思想的萌芽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就已发生。最早见于印度宗教、神话、历史汇集的《吠陀》以及随后出现的哲学诗篇《奥义书》中。《吠陀》宣传对自然力量崇拜的多神论，而后，哲学思想便从吠陀宗教思想中分离出来。吠陀诗人提出了关于宇宙形成、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的本质、灵魂和肉体的关系、死后有无存在等种种问题，并给予回答。有些赞歌宣称：思维（巫师的直观能力）、识、虚、无、我（灵魂）、梵等是世界的根本原因；有的则认为世界是由水、火、风、地、金卵等所派生或结合而成的。《奥义书》提出了一种叫“梵我同一”的原理。它们宣称：作为外在的、宇宙终极原因的梵和作为内在的、人的本质的我（灵魂）在本性上是同一的，但是由于人的无知（无知），受到业报规律的束缚，把梵和我看做两种不同的东西，如果人能摒弃社会生活，抑制情欲，那么，他就可以直观灵魂的睿智本质，亲证梵我的同一，从而获得最后的解脱。

在古代的西亚也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波斯流传下来的宗教历史文献《阿维斯陀》（《波斯古经》），相传为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人琐罗亚斯德的说教。《阿维斯陀》宣称：在原初的时候，

存在着对立的善恶两元，善元之神阿胡拉·玛兹达是光明、生命、创造、善行，也是天则、秩序和真理的化身。恶元之神安格拉·曼纽是人格化了的黑暗、死亡、破坏和恶行等一切罪恶的渊藪。善元和恶元进行了长期、反复的较量和斗争，前者终于战胜后者。于是玛兹达被尊为“宇宙的主宰者”、“光明王国和黑暗王国的统治者”，成了唯一的、最高的存在。在琐罗亚斯德教的形成过程中，有些异端的神学家为了解决善、恶两元的矛盾，在理论和逻辑上常常假定在两者之上有一个最高的实体——“佐而文”（旧译“察宛”，意为“无限时间”），因此，琐罗亚斯德教被称为哲学上的二元论和神学上的一元论。

公元前6至前5世纪是世界宗教、哲学运动蓬勃兴起时期：在波斯，琐罗亚斯德建立了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出现了春秋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希腊，诡辩派开展了大规模的活动。与此同时，在印度出现了与婆罗门教相对立的沙门思潮，即自由思想家的统称。沙门思潮有“六师”（即六派），其中主要的有顺世论、佛教、耆那教和生活派（邪命外道）。顺世论是印度乃至东方最大的唯物主义派别，该派认为世界的基础是物质，物质由“四大”（地、水、风、火）所构成，一切有生命的物类均由“四大”和合而生，人死后还归“四大”，因之，它否定灵魂的存在，认为灵魂和肉体不可分，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在社会观方面，顺世论主张种姓平等，反对祭祀和业报等。佛教是沙门思潮最大的派别。原始佛教在说教中提出了一套哲学主张——四谛十二因缘说。它们认为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存在都依赖于一定的条件（因缘）。离开了这些条件，就无所谓存在。“十二因缘”就是从无明到生死彼此成为条件或因果联系的十二个环节。耆那教宣称：世界由多种原素所构成，这些原素大致可以分为灵魂与非灵魂两种，非灵魂的原素又可以分为物质和



不定形物质两种，前者由原子复合而构成，后者则由运动的条件（法）、静止的条件（非法）和时间、空间四者所组成。这种学说是一种多元论的实在论。在社会伦理思想方面主张苦行（包括非暴力）、业报轮回和解脱。生活派认为，宇宙和世界上一切有生命的物类是由灵魂、地、水、风、虚空、得失、苦乐、生死等十二种原素构成的，各种原素的结合“定合有其自性”，在“命定”的锁链中，人的意志是无能为力的。

在公元前后几个世纪，印度婆罗门教系统内出现了很多哲学派别，印度常常把承认《吠陀》权威的婆罗门教六派哲学称为正统派，而把上面所述不承认吠陀权威的顺世论、佛教、耆那教、生活派等称为非正统派。在这个时期内，正统派的一些创始人或理论奠基人创作了各派的经书《梵经》、《前弥曼差经》、《数论颂》、《瑜伽经》、《胜论经》、《正理经》，从而形成了吠檀多派、弥曼差派、数论派、瑜伽派、胜论派和正理论派。

## 二、中世纪哲学

中世纪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东方各国都有自己的解释。但很显然，在东方各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连接古代和近代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有它自己的特点，特别是在哲学思想资料的继承方面有它的连续性。不少学者认为印度的中世纪开始于3至4世纪，即统一的印度笈多王朝时期迄18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在印度中世纪初期，印度正统派哲学六个派别日益系统化。正统派中起源最早的是数论。数论作为二元论是在自在黑的《数论颂》等中表现出来的。

瑜伽的实践是在毗耶沙等对《瑜伽经》作注以后才完整起来的。该经认为，达到真理的方法有八种，这些修持方法类似我国的气功。

弥曼差是婆罗门教中研究祭祀仪式等问题的一个学派。在四五世纪山隐尊作注以后才完备起来。

胜论是在钵罗奢思波陀（400—450）对《胜论经》作注以后才形成系统的哲学体系。

正理论着重探讨了认识的方法、逻辑推理等问题，把认识的对象、辩论的方法等概括为十六个范畴，把推论的形式分为五支。

吠檀多不二论的主要代表是乔陀波陀（640—690）和商羯罗（788—820）。他们认为真实不二的梵是世界万物的始基，梵是统一的、纯粹的，不具有任何属性、运动和因果。但是某些没有宗教修持的人由于无明（无知），从下智去看它，给它附上种种的属性如全智、全能等等，神也是其中的一种，这样梵就有了上梵和下梵之分。世界是梵的一种幻现或假象，如同绳被幻现为蛇一样。11世纪以后，印度出现了以改革印度教为宗旨的虔诚派运动。在吠檀多中也出现了罗摩努闍（约11—12世纪）的制限不二论，摩陀婆（1197—1276）的二元论，尼跋伽（14世纪）的二元不二论和筏罗婆（1473—1531）的纯粹或清静不二论。以上这些派别围绕着梵、灵魂和世界的关系，进行了喋喋不休的争论。

在中世纪，佛教由小乘转入大乘，分为中观派和瑜伽行派两个主要教派。中观派的理论奠基人是龙树（约150—250年间）。龙树把他的最高真理称之为空。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以及人们的认识，甚至包括佛陀本人都是一种相对的、依存的关系（因缘），一种假借的概念或名相（假名），它们本身并没有实体性或自性，只有排除了执著这种“名相”的偏见，才能达到真理或“空”。瑜伽行派的理论奠基人是无著（395—470）和世亲（400—480）。他们认为，应把“空”和“有”（对现象世

界的认识)结合起来。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由人们的精神总体或作用——“识”所变现出来的,所谓“万法唯识”、“三界唯心”。

在7世纪伊斯兰教建立以前,阿拉伯哲学在继承古代埃及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还受到了古代希腊哲学的影响。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城一度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中心,在那里曾建立过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出现过像欧几里德和托勒密这样的伟大科学家。这些对后世有重要影响。7世纪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建立伊斯兰教。他宣布《古兰经》是伊斯兰教义、哲学、法学和伦理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伊斯兰教宣传一神论,认为真主是唯一的、绝对的和永恒的存在,具有一切完美的德性。7世纪末倭马亚王朝在大马士革定都后,在伊斯兰教内部出现了苏菲派,该派除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本教义外,还受到希腊、波斯、印度等的宗教哲学思想的影响。苏菲派以神秘主义著称,宣传泛神论和神智论,要求通过内心修炼,达到与真主的合一。8世纪初在伊斯兰教中出现了最早的神学—哲学派别——穆尔太齐赖派,该派提倡运用理智,自由讨论伊斯兰教信条,反对宿命论的“前定论”,主张人有意志自由。10世纪从穆尔太齐赖派中分化出来的艾什尔里(873—935)及其追随者们建立了新凯拉姆(经院哲学),这派调和理性与信仰,以理性论证正统派的信条,强调真主的全能和世界的变幻莫测。以后的安萨里(1058—1111)还引进了苏菲派的神秘思想,从而完成了伊斯兰教经院哲学的最终形式。

9—12世纪,在阿巴斯王朝的一些帝王的奖掖下,阿拉伯的学者对希腊科学、哲学著作进行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翻译和注释,另外,还翻译了波斯和印度的一些古典著作。在传播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学说、新柏拉图主义和东方传统思想

过程中，在阿拉伯穆斯林的统治地区——东部的巴格达和西部的科尔多瓦出现了一批哲学家。他们的代表是铿迭、法拉比、伊本·西拿、伊本·图斐利、伊本·鲁西德和伊本·赫勒敦等等。这批哲学家一般接受了受新柏拉图派影响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并力图 and 伊斯兰教信仰相调和。他们都承认真主作为最初实体和始因而存在，认为世界万物是由真主通过理性、灵魂等一系列精神的实体流溢而出，但又承认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其间有着因果关系。真主对世间的关系是通过媒介物间接地起作用，这种“流溢说”或“双重真理论”等是当时和伊斯兰教正统派经院哲学进行斗争的最好思想武器。

13世纪中叶蒙古人入侵伊斯兰世界后，随着阿巴斯王朝的覆灭和伊斯兰教徒在西方的失势，由多民族组成的、统一的阿拉伯哲学从此不复存在。中世纪阿拉伯的科学、哲学和伊斯兰教文化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最高的水平，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由于阿拉伯世界保存了大量的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使古代欧洲哲学遗产未遭湮灭，从而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西欧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公元前4世纪末，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地中海东部各国，随着希腊文化传入地中海东、西地区，犹太教受柏拉图主义与斯多噶派影响很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拉比斐洛·犹太的哲学。他以柏拉图的理念说、斯多噶派的逻各斯学说解释犹太教的律法书，使犹太教具有了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拉比斐洛认为，世纪是由神的动力因与未具形体的原始质料因两者所构成的。神通过逻各斯（道）使神与物质相通，在逻各斯的中介下，神在经历的各种不同阶段与感官世界相连接，从而创造了世界。逻各斯既是神或“观念”的统一，又是宇宙一切力量的根源和犹太教神坛中有最重要地位的天使。

自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在犹太教内地位仅次于

《圣经》的经书《塔木德》逐步形成。《塔木德》在处理神与世界的关系上，它既信仰神的彼岸世界，也肯定神所创造的现岸世界的一切，甚至主张：今世一个时辰的悔罪善行胜过来世永恒的生命。

· 在生命观方面，《塔木德》主张灵魂肉体二元论。认为人的灵魂像天使，理性与道德（善）都来自灵魂。人的肉体与情欲相连，如同禽兽，但善与肉欲并非绝对对立，善恶争斗是在灵魂中进行的。因此《塔木德》认为，伦理道德的终极目标不是脱离世界，而是在世界之中，使肉体服从灵魂导引，遵行犹太教律法侍奉神。另外，《塔木德》强调人的自由意志。

9—12 世纪，犹太教哲学家萨迪阿（892—942）首先把《圣经》译成阿拉伯文。他力图用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调和理性与启示，论证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所罗门·伊本·加布里奥（1020—1070）是犹太哲学在西班牙的杰出代表。他以新柏拉图派的观点解释犹太教的神学，认为神的意志既来自神的本质，又与神的本质有区别，神的本质是无限的，而神的意志的具体表现则是有限的。因此，神的意志成为神的本质与神所造质料、形式的中介。12 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哲学已在犹太哲学中占主导地位，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是摩西·本迈蒙尼德（1135—1204）。他力图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论证犹太教的教义，强调人们必须要用和理性一致的东西独创性地去解释犹太教教法。他宣称：宇宙永恒这个命题虽然不能得到有力的证明，然而，以逻辑和经验推理，世界从虚无中被创造出来和灵魂永生也是有可能的。这些说法实际上是违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

日本哲学思想最早见于 8 世纪编成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它们是曾受到中国哲学思想、特别是儒学思想影响而成的最古老的典籍。这两部典籍记录了日本古代的神话、英雄传

说、歌谣和帝王的家谱，但从这些内容中可以看到日本哲学思想的萌芽。《古事记》论证皇统即神统，宣传神道教的神灵创造了天地、日月，并对宇宙的形成、人的起源作了种种哲学思辨。《日本书纪》也记录了世界创成、国土繁殖的神话。

继3世纪前后儒家思想传入日本后，6世纪中叶佛教也经过朝鲜传入日本。佛教在奈良时期（710—784）扎下根来并日益得到发展，出现了“南都六宗”（三论、法相、俱舍、成实、华严及律宗）和“奈良七寺”，这时佛教教义已传入日本，但没有创新。直到平安时期（994—1184），最澄和空海留学回国分别创立了天台宗和真言宗，才确立了日本的大乘佛教思想。他们在哲学上都宣传“世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和“一念三千”的唯心主义思想。平安时代后期，在日本佛教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要使本国固有的神祇崇拜与外来的佛陀、菩萨崇拜融合起来，即所谓“神佛习合”思想；另一种是对流传于贵族中间、教理深奥的天台、真言宗不满，在民间产生了净土思想，这为后来净土宗、日莲宗等建派创造了条件。禅宗传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奈良时期，但真正建立日本临济禅的是由中国回去的荣西（1141—1215），临济禅因袭中国的禅学思想。另一个传中国曹洞禅的道元（1200—1253）又把禅宗的主观唯心主义推到极端，宣传“心者一切法，法者一切心”的思想。

朱子学从13世纪传入日本后一直依附于佛教。到江户初期，在德川幕府的支持下，才开始从佛教分离出来。当时日本的儒学体系主要分为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和古学派。朱子学被奉为官学，长期处于主流地位。此外，在江户时代还出现了复兴神道的一些派别和某些不属于任何传统或反传统的启蒙思想家。朱子学在日本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流派，对于朱子学的解释也有不尽相同的说法。朱子学的创始人是京师学派的藤原惺

窝（1561—1619）及其学生林罗山（1583—1657）。他们以朱熹的性理说反对佛教的出世主义和基督教的创世说，使儒学摆脱了禅学的束缚而得到独立发展。这个学派中的人对于哲学基本问题和社会伦理道德思想有着不尽相同的主张。例如贝原益轩（1630—1714）和安东省庵（1622—1701）把自己的世界观归结为“理气合一”论，而山崎闇斋（1618—1682）、佐藤直方（1650—1719）等则归结为“理一元”论，这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分水岭。山崎闇斋甚至还把儒学和神道结合起来，使朱子学神道化。会泽正志斋（1782—1863）、藤田东湖（1806—1855）等还提倡封建名分论和尊皇攘夷思想，这都是要为德川幕府的统治作理论论证。

古学派排斥汉唐以后的儒学，认为只有古代的儒学才有意义。这派名为复古，实际上是要摆脱朱子学的控制，其代表人物是山鹿素行（1622—1685）、伊藤仁斋（1627—1705）和荻生徂徕（1666—1728）等。这派人在哲学上一般都主张气一元论并以此反对朱子的性理论。

阳明学提倡王阳明的“心学”或良知说。其代表有中江藤树（1608—1648）、大盐平八郎（1794—1837）等，这派中的人虽然在哲学上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但其中某些人还具有辩证法思想。他们重德教，重实践，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事功派。

日本的神道教是固有的民族宗教，是在日本民族固有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已有二千年的历史，其间受到了儒、佛等外来思想的影响，大体上经历了原始神道、神社神道、国家神道、神社神道和独立神社并行等历史阶段。在德川幕府时期，出现了复古神道，这种神道排斥儒、佛等的思想影响，提倡“日本精神”哲学，鼓吹敬神爱国、崇祖尊皇、神皇一体、祭政一致、八纮一字等思想。这些思想在皇政复古和明治维新中起

过重要的作用，但后来又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武器。

在江户末期，日本封建社会开始瓦解，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日益停滞、没落。在西方自然科学（兰学）的影响下，在日本出现了不少与传统格格不入或反传统的思想家。他们中有代表农民思想的安藤昌益（1703—1862），反映新兴市民利益的三浦梅园（1723—1789）、山片蟠桃（1746—1821），有力图探索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哲学的皆川湛园（1734—1807）和为心理学开拓道路的镰田柳泓（1754—1821）等。他们一般对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和古代唯物论的影响，反映了在封建统治下的农民和新兴市民的要求和利益。

我国周边的另一国家朝鲜也有着悠久而又丰富的哲学历史。1世纪前后，朝鲜半岛先后建立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封建国家。中国的儒学开始传入。而后，我国佛教的各个宗派和学派也相继传播，在朝鲜形成了“五教九山”。6—7世纪新罗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佛教哲学家，如圆光、慈藏、慧超、圆测、元晓、义湘等。新罗的佛教受到中国的影响，但也有着独自的发展道路和特质。例如圆光把“三归五戒”解释为“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有信”、“临战无退”和“杀生有择”，这明显是和印、中传统解释不同的。被称为“八宗之祖”的元晓（617—686）提倡“归一心源说”，力图调和“百家之异争”。他从“和诤论”的立场出发，不仅对朝鲜而且对中国的各种佛教派别进行了批判。9世纪初禅宗在朝鲜崛起以后，禅宗和教宗（禅以外的其他混合教派）分庭抗礼，持续了几个世纪。禅宗的代表是曹溪宗创始人智讷（1158—1210），他调和禅教二门教义，创立了“真心说”。

6—7世纪新罗出现了影响很大的社会思潮——花郎道思



想，它把儒家的忠孝，道教的无为和佛教的积善思想融合成为一种道德伦理思想体系，这种思潮在新罗统一三国中起过作用。

7世纪朝鲜建立了统一国家，鼓励贵族子弟学习儒家经典，儒学得以发展，逐渐成为统治思想体系之一。14世纪李朝建立之后，独尊儒术，在以后的500年间，朱子学一直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在14世纪，它的代表人物是李穡、郑梦周和郑道传；15世纪是权近、金时习；16世纪是徐敬德、李滉和李珥。以上这些哲学家围绕理、气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喋喋不休的争辩，从而形成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阵营。例如徐敬德提出了“气不灭论”，他以“元气”的聚散、离合解释物质运动的变化，并以“机自尔”（自己内部的推动）解释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李滉主张“理一元论”。他提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的观点，开启了朝鲜数百年“四端七情理气之争”，而李珥则以“理气二元论”反驳“四端七情论”。他认为理气“浑然无间，无先后，无离合”。

17世纪初至19世纪上半叶的200年间，在朝鲜兴起了实学思潮。这种思潮讲求实效、实理，反对朱子学的空谈性理，主张经世致用，改革时弊。这个派别的思想家们在哲学上都坚持“气一元论”，并借助当时自然科学、技术的成就，对很多自然和社会现象作了比较正确的解释。

在东南亚的邻国中，越南与我国文化交流最早，早在公元前前后儒释道思想就伴随着中国文化相继传入越南。10世纪越南建立独立的封建国家后，佛教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越南早期建立的几个禅宗派别（毗尼多流至禅派、无言通禅派和草堂禅派）都是由中国传入的。到13世纪初，越南开始建立了自己的宗派——竹林禅派，该派代表是慧忠上士和陈仁宗，他们宣传“心即佛，佛即心”的禅宗哲学思想。慧忠曾说：“迷去色空色，